

# 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台湾地区族群印象

## ——基于多维互动的视角

卞梁<sup>1</sup>, 连晨曦<sup>2</sup>

(1.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特殊的海洋地理条件与历史演进过程,为多元文化在台湾地区“生根发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西人这一“他者”视野能够跳脱原有中文语言体系的束缚,更为完满地呈现19世纪中西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互动,这是借助族群间的互动观察与评价实现的:其一,西人以其西方视角指出汉人文化的滞后性,却对汉人的勇敢勤劳给予了肯定。其二,西人在展现少数民族原始朴素的同时,别有用心地挖掘其宗教属性。其三,西人对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西人形象进行了反驳,并尝试重构其自身形象。其四,对于汉人与少数民族两者的相互评价,西人大多不予置评,却隐晦地对后者表示支持。虽然西人在多元变换视角下对台湾社会、文化进行的考察,得以呈现出更为真实、动态的近代台湾社会图景。然而,多元视角下的族群形象互动,却依旧难以摆脱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歧视格局。

**关键词:**台湾族群观;多元视角;中西文化;互动融合

**中图分类号:**K291.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36-06

一直以来,神秘的“东方”作为世界的另一端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符号,与黄金一起成为萦绕在西方人耳边的探险宣言:“我带你们去看各色人种,你们会看到所有的东方人:近东人、中东人、远东人。”<sup>[1]4</sup>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掀起了近代西人来华的高潮。台湾地区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前沿,无疑成为当时西人来华的选择之一,中西文化藉此在台不期而遇,并产生一系列互动,形成了“中华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并存”的台湾地区文化体系并演化至今,对台湾地区历史发展与当前两岸关系之演进有重要影响。

多元变换视角强调多种观察视角的比较、切换与辩证统一。19世纪中西文化在台湾地区碰撞融合的复杂性使得多元变换视角具备可操作性。从西方人对在台汉人的看法、西方人对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看法、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看法、汉人与少数民族彼此认知四个方面入手,对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文化在台的“冲击与回应”进行学术考察。

### 一、西方人对在台汉人的看法

西人对在台汉人的观察视角多样且研究水平

参差不齐,但人种研究无疑是当时最常见的研究。总体而言,西人对在台汉人持否定的态度。虽然他们肯定汉人对台湾地区开发的巨大作用,却对汉人的群体性特点进行了一定批判,属于以偏概全的观察模式。史帝瑞认为汉人的外观“跟他们中国的弟兄没有什么两样”<sup>[2]209</sup>。同时,史帝瑞还可以通过皮肤日晒程度区分汉人的工作,“那些富贵了好几代的汉人,肤色几乎跟欧洲白人一样。而那些劳力阶层因为工作时大都袒胸露背,且必须暴露在烈日下的缘故,所以被晒得有如福尔摩沙的生番,或美国的印第安人那般黝黑”<sup>[2]209</sup>。史帝瑞认为是汉人将台湾的广袤平原开发出来:“在汉人两百多年的垦殖下”,台湾地区“西部已经呈现出真正的中国风貌……这里并不是男人只身前往,挣够钱后便离开的地方,而是携家带眷的定居之处,他们千辛万苦地离开大陆,将福尔摩沙改造成大陆家乡的风貌”<sup>[2]191</sup>。他还大致介绍了下当地汉人的概况:“当地汉人人口估计在五百万人。汉人所居住的地区,被划为一个府,是福建省下的一个部门,其首府设在台湾府。‘府’下设有四个‘县’,分布在西海岸,向东纵深可达生番

收稿日期:2020-08-18

作者简介:卞梁(1989—),男,浙江杭州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连晨曦(1988—),男,福建莆田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所居住的山脚下。”<sup>[2]194</sup>

汉人根据居住地不同分为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两类。在城市中的汉人多为产业工人和生意人,马偕描述道:“在都市和城镇里可看到各类的工人和生意人。所有的工作都是用手在做,听不到机器声。”<sup>[3]106</sup>同时工种亦多种多样,“包括打铁工、木匠、家具师傅、办殡葬的、刻神像的、镶银饰的、铜锡匠、农具制工、锁匠、织工、裁缝师、染工、鞋匠、水泥匠、石匠、窑砖师傅、烧石灰工等”<sup>[3]106</sup>。工人的收入亦各不相同,“技术熟练的工人每天可得三、四角,而普通的工人通常赚不到二角半。他们一般都很节俭,他们的花费和西方的工人比起来也很省,不过他们的生活通常都很乏味而且辛苦”<sup>[3]106</sup>。生意人则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小店,“棉被店是很重要的,水果摊和鱼摊买的人很多”<sup>[3]106</sup>。

总体而言,汉人有着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这与汉人长期以来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密不可分。当史帝瑞来到汉人村落时,他的这种感觉尤为明显。他的汉人朋友是个拥有大量甘蔗田的农场主,史帝瑞认为“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像美国的大农场主”<sup>[2]95</sup>,因为整个村落都以他为中心,“里面全都住着他的雇工,脚下全踏着他的土地。农忙时节大伙在他带领下收甘蔗”<sup>[2]95</sup>。西人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在台汉人的农业耕作已与大陆发达地区几无差异,均施行佃户制。当时“大部分农人的农地是租来的。事实上,北台湾的农地一半是属于同一个地主所有,他把地出租,租金通常用农地上的产物来偿付。这些佃农通常一生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儿子结了婚也和父母同住,二代或有时三代同堂”<sup>[3]108</sup>。即便如此,汉人的饮食依旧较为清淡简朴。“他们的主食是米饭,通常再配上咸鱼和酱菜。”<sup>[2]209</sup>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什么阶层的汉人,他们的饮食都很简单、便宜。“富裕的汉人家庭,一天消耗的食物不过五、六分钱;贫穷的汉人家庭,可能只要三、四分钱就能度过一天。”<sup>[2]209</sup>但汉人招待朋友时却很热情周到,“主人招待我们一顿丰富地道的中菜大餐,十几道菜陆续端出来,有鱼有肉有蔬菜水果,有茶有酒。他陪我们吃,并不停地帮我们夹菜”<sup>[2]95</sup>。

西人与汉人的接触过程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因文化间的隔阂和疏离所造成的不适感,导致西人对汉人的整体印象趋于负面。他们将之首先归因于台湾地区纷乱的社会状况。麦高温曾指出,台

湾地区“除了容易辨认的土著民族外,还住着各种不同的中国族群,按语言和文化的特征孤立存在。其中有来自广东的被其他族群蔑视的客家人,以及操厦福方言的福建人”<sup>[4]86</sup>。也有其他西人认为,虽然“客家人比福建人还灵巧,很会做生意,本性勇敢”<sup>[5]</sup>,但却缺乏足够的理财观念,“他们能过一天算一天,一点都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sup>[6]234</sup>。其次,西人认为这是因汉人对传统习俗的遵从。在西人看来,汉人不仅“难以理解任何新的习俗”<sup>[6]236</sup>,且“很固执,为追讨抵押品可谈上二十年,为追讨土地甚至可以持续两百年”<sup>[7]180</sup>。当然,西人确实反映了一些汉人固有文化中的迷信与陋习,如相信“吃过死刑犯内脏可以增进勇气”,因此在罪犯被处予死刑后,“刽子手会将死者的肝脏挖出来,过油煎烤后食用,并把剩余的卖给观众”<sup>[8]96</sup>。但在西人语境中,这种迷信却被用来衬托西人的苦难。如“台湾一位不幸的基督教徒被一群汉人暴民扯成碎片,最后他的肝脏就如上述那样被人吃了”<sup>[8]97</sup>。又如西人对妇女裹足陋习的描述:“汉人妇女沿袭她们先人的裹足传统,即使是劳动阶层的妇女也不例外。女孩子大约从七岁起就开始裹足,直到脚成为三寸金莲。”<sup>[2]209</sup>西人用同情的话语讽刺了这一陋习:“虽然妇女的脚部遭受如此摧残,但贫苦人家的妇女,仍然得承担许多劳务,经常可以看到她们痛苦地在田里工作,或在池塘边帮忙丈夫捕鱼。”<sup>[2]209</sup>而对于苦力,西人的批判似乎亦毫不留情,认为“苦力是喜欢闹事的一伙流氓”<sup>[9]</sup>,这显然是对中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的起因,在西人看来竟因汉人而起,颇有“贼喊捉贼”之感。他们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及对未知的初始恐惧,汉人始终对西人保持着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很快便在两者间滋生了谣言、中伤以及恐惧。如当时西人将台湾地区的官方描述为既奸诈又顽固的人群:“这些官员穿着一大堆排扣,向居民煽动说外国人是群魔鬼,与吃人肉的怪物相差无几。”<sup>[7]69</sup>李仙得将汉人官员污蔑为台湾地区社会动荡的原因:“他们努力贪污,贿赂长官以躲避监督,导致司法体系正义不彰,需仰赖氏族领袖维持秩序,但官员难以控制氏族领袖,本身又十分腐败,使得械斗不断、叛乱频发。”<sup>[10]11</sup>必麒麟更是认为汉人官员挑拨西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自言“除非是中国官吏的介入,否则我和汉人与原住民的关系,一直极为友

好”<sup>[8]105</sup>。侵台法军士兵简更是将中国官员视为滥用酷刑的恶魔：“中国官员毫不留情，他们禁止老百姓卖东西给我们，一被抓到不是脑袋被割下来，就是处以笞刑，或用钩子勾在胸部或腹部上然后挂起来，这种马上就会把做生意的念头打消。”<sup>[11]71</sup>

总之，西人在肯定在台汉人身份的同时，始终将其置于外来者的地位。数百年前自陆迁台，并在台湾地区繁衍生息的广大汉族同胞并未获得西人正确的认识。

## 二、西方人对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看法

相较于与在台汉人群体的直接对抗，略显原始与野蛮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反倒受到西人更多关注甚至赏识。西人一方面着墨于少数民族的野蛮，称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野蛮民族，以谋杀汉人为荣”<sup>[12]121</sup>，另一方面又否定他们的中国人身份，试图将其看作诸多种族的混合，“他们是中国人、马来人和日本人的混血，甚至有可能是马来人、菲律宾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混血，带一点日本人的肤色，比中国人的肤色还深一些”<sup>[12]121</sup>。

必麒麟通过自身观察，细数平原少数民族与山地少数民族的差异。首先，从人数及分布情况看，平原少数民族多于山地少数民族，“全台约有超五十万名熟番，而生番的数量则无际可查。但应少于熟番人数。依生番勇士的数目计算：小族约有三十至一百名勇士，大族则拥有一千至二千名战士”<sup>[8]105</sup>。其次，西人观察到以“平埔族”为代表的平原少数民族，在外观上已呈汉化趋势。如必麒麟发现他们有着“乌黑的大眼睛，阔嘴，微翘的上牙”<sup>[8]94</sup>。同时，平埔族人体态特殊，“更为高挑清秀，多数族人已剃发，传汉服，讲汉语”<sup>[8]94</sup>。即便如此，必麒麟依旧认为“他们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族群”<sup>[8]94</sup>。再次，在西人看来，少数民族有着简朴的生活状态，却有保持卫生的特殊途径。平埔族以农业为生，“虽个个是好农夫，但产量却不如汉人”<sup>[8]94</sup>。不过他们“不喜好鸦片，擅长打猎、喝酒，还喜欢用稻米或番薯酿制土酒，味甜性弱，不易喝醉”<sup>[8]94</sup>。此外，他们有着高超的制陶技艺，制作的水瓮与叙利亚及迦南地区生产的水瓶很类似，“只是没有那么长，而且两边有耳朵以便手拿。他们都把它顶在头上，当瓮子是空的时候，就把它倒过来戴在头上。瓮口的宽、直径均有六寸，戴起来像是帽子”<sup>[3]235</sup>。

平原少数民族有保持个人卫生的习惯及其洗浴设备，一些村子甚至设有公共浴场：“从岩石旁流出一条清凉的溪泉，以此供应村民洗浴用水。浴场的装备很简单，有两根裂开的竹管让水喷出”<sup>[3]238</sup>。少数民族浴场自有其使用规范：“在浴场里，男士站在溪泉的外边洗，女士则站在里边洗。”<sup>[3]238</sup>良好的秩序营造出轻松的氛围：“等冲够后，她们才把水瓮拿起来，顶在头上走回家，还边走边唱歌。”<sup>[3]238</sup>

山地少数民族的外观及生活状态则显得更为原始，不过必麒麟认为他们并不会如传闻所说的那样吃人：他们“多居住在深山地区，鲜与汉人接触。住在西部的汉人相信”他们“长着尾巴，模样像猿猴”，“以部落形态群居。他们所居住的房子用石头建造，屋顶也是石板瓦，外观十分洁净，也有若干部落用竹子茅草和泥土建造房子”<sup>[8]96</sup>。

虽然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十分野蛮，但西方人却对其欣赏有加。麦高温认为“比起日本人和中国人外表上的礼貌，他们显得很勇敢也很有人情味”<sup>[4]76</sup>。汤姆森也认为“他们诚实、乐观且随和，这是他们种族本源的特性……正因为其温柔、不伤人，因此被汉人驱赶到贫瘠的土地上”<sup>[5]101</sup>。必麒麟认为平埔族性格随和，他认为虽然平埔族对婚姻义务的概念有些随便，但总体而言，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较汉人高尚，并称赞“平埔族与汉人的中下层阶级比较接近，他们都显得更纯真无华”<sup>[8]93</sup>。

有关山区少数民族的谋生情况，至今尚未有定论。必麒麟认为他们结合自身实际生活情况，因地制宜，以捕猎或捕鱼为生：“他们都是英勇、技术高超的猎人和渔夫，即使年纪轻轻的猎人，也能轻易猎取一只鹿。通常，他们有一种特殊品种的狗帮忙打猎。我拜访过几个部落后，发现男人们除了打猎、捕鱼、战斗和制造或装饰自己的武器外，心里并无其他悬念。”<sup>[8]198</sup>但史帝瑞却记载其通过耕种与贸易为生：“这些生番们种植旱稻、甘薯和烟草，但是他们日常所食用的，大部分是与汉人交易得来的。”<sup>[2]244</sup>而很多中文文献在谈及生番时，均认为其无耕种，如《台湾府志》载：

番素朴愚，不知权量。今诸罗之新港、萧陇、目加溜湾、麻豆、哆咯咽、大武垵等社，去府治颇近，多事耕田，犹能以钱贸易。余社则以其所有，易布、絮、盐、铁之类于社商而已。凤山之下淡水等八

社,不捕禽兽,专以耕种为务,计丁输米于官。<sup>[13]57</sup>

而对少数民族“无一神论”的赞美,似乎有着很强的传教目的性。如必麒麟歌颂平埔族“平日奉行汉式宗教仪式,但也保留多种传统的习俗”<sup>[8]94</sup>。马偕也认为,少数民族未接受过任何“先入为主”式的宣教,有利于基督教在其族群中的传播:“他们从来不曾听过上帝之名,也不知道神的恩典和真理。他们的生活充满劳苦和艰难……他们的心受到许多迷信而变得黑暗,他们也无法理解任何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没有祭司、偶像或庙宇,而是不论在地里、空中和海里,处处都有令他们害怕的神灵……所以要让他们基督教化,就需要有专门对当地的宣教工作。”<sup>[3]238</sup> 而少数民族亦没让西人失望:“在我的经验里,长老教会的传教士最受平埔族人的欢迎,已有不少平埔族人受洗为基督徒了。”<sup>[8]105</sup>

少数民族妇女也是西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平埔族妇女身体饰有刺青,必麒麟记载“多数妇女手臂上有刺青装饰,若干部族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上,做些刺青的标志”<sup>[8]99</sup>。而史帝瑞的观察更为细致:“当女人结婚后,她们两耳之间的脸庞上,就会刺下如下的纹线:最上面是三条简单的纹线,下面是一连串的 X 形条纹,这些 X 形条纹夹在两条纹线之间,接下来是两条纹线以及一串 X 形条纹,最下面则是四条简单纹线。”<sup>[2]240</sup> 在西人看来,少数民族妇女与众不同:她们不像汉人一样缠足!另外,她们不像汉族妇女那么早就憔悴,也不像她们那么假正经。<sup>[6]237</sup> 必麒麟认为她们比西方妇女更自由,因为虽在公众面前表现拘束,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却有着更多的话语权,且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sup>[8]72</sup>。

此外,在西人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中,似乎不断强调其与少数民族存有良好的往来关系。必麒麟甚至认为“除了南岬的龟仔律之外”,少数民族“天生对欧洲人颇有好感,尤其是平埔族人,更会把欧洲人当作是朋友”<sup>[8]105</sup>。

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西人的这一结论进行解释可以发现,西人在突出反映少数民族的原始、野蛮甚至血腥的同时,对“为什么这一族群在‘文明古国的门户’上如此之久却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sup>[9]</sup>感到奇怪,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方宗教相关联,并在往来信件中极力营造神秘主义氛围,以此获取母国资产阶级的认可与支持。

### 三、汉人与少数民族对西人的看法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汉人早已习惯将自身置于世界中心,对西方人有强烈的抵触感与厌恶感。在台汉人自然带有这一明显倾向。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汉人将西方人看作一种低等的“生物”,并以施舍为乐:“中国人似乎一直相信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就是苦力也迫不及待把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让我们同样地能够在中华文明中得到好处。”<sup>[5]</sup>甚至将西人与动物等视,并描绘其“男人出生时头发很长,以树叶蔽体,有的以单腿蹦跳,其他的用鸟爪装饰自己,在额头上有一颗巨大的眼珠,女人有很多乳房,男人在心脏部位有许多大窟窿,以便像鲑鱼一样能被串起来或挂在杆上运走。最后有那些长了翅膀的人,他们能在空中飞翔”<sup>[5]</sup>。

当然,在台汉人形成这种偏见也有其必然之缘由。除上述潜在的“中华中心主义”外,主要还有两点。其一,从政治的角度看,虽然西方人大多打着和平与中立的旗号,但西人赴台显然会给当地的社会治理和地区稳定带来潜在的危险。如法国将殖民统治包装为“共荣共治”这一假象:“法国在这地区的使命是充当所有邻国之间的调停人,它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他们建议,以确保该区的和平、安全和宁静,让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增加各省的人口……提升他们居住地区丰富的文化,使他们生产全人类需要的原料以换取他们的福祉和繁荣。”<sup>[14]12</sup> 因此,清廷在与西人交往时往往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清廷认为认识外国人的个性,对外交关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其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中国人常将西方人视为恶魔的原型,并加以渲染。如宣称“双眼透明的西方鬼子需要中国孩童的黑眼来制造他们珍贵的药材,用他们的内脏、脑髓制造摄影产品,使铅变成纯银”<sup>[15]44</sup>。而台湾少数民族对西人的形象诠释则相对温和。由于西人在途经少数民族区域时常给一些肥皂、小珠子、红布、镜子等小恩惠,因此他们认为“外国人都很友善”。如李仙得行经猴洞平埔族时,将一些英国红布和珠宝送给头目 Assam,送“一些干鹿肉和新鲜猪肉作为友谊的纪念物”<sup>[16]25</sup>。但即便如此,西方人亦承认“他们有时也对行为不检点的欧洲人表现出敌对态度”<sup>[8]97</sup>。可见,少数民族对西人仍采取防范性措施,有着较明显的边界感。

由此可见,当时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对西方人的整体看法依旧趋于负面。对于这种负面解释,英国人富兰克认为这是在“西强东弱”格局影响下,中国人对外部冲击展现出的强烈的应激反应。他认为中国人把西人归于妖怪、魔鬼、幽灵之列,同时使用“洋鬼子”“番”“岛夷”等带有歧视的称呼抹去西人的人性,试图用“二分法”将世界分为有人性的中国人及野蛮的外国人<sup>[17]36</sup>。

#### 四、西人眼中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评价

长久以来,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呈现着矛盾与纠结的状态。这一状态很早便被西方人观察到并记录下来。首先,西方人发现,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形象建构较为单一和固化。如认为少数民族个性凶狠,以猎人头为乐,凸显其野性。如法国探险家杜尔维勒便从当地汉人口中得知少数民族“在节日庆典的宴会上吃老人、孤儿和残障的人”<sup>[18]343</sup>。汉人还常组织武装力量围剿消灭当地少数民族,血腥的厮杀时有发生。如史帝瑞描述了当时汉人建有诸多前哨站点:“站哨的人发出讯号让其他人知道我们靠近的消息。这些小哨站经常成为生番和汉人之间的血腥战场。”<sup>[2]194</sup>另外,少数民族对汉人亦充满着仇视和憎恨。如史帝瑞听说一个汉人哨站确曾遭遇少数民族袭击:“他们在哨站四周堆积了干草堆,然后点火把哨站的人活活烧死。”<sup>[2]194</sup>李仙得甚至认为,少数民族对西人的好感是建立在对汉人的仇视之上的,意图共同抵抗汉人<sup>[10]90</sup>。

事实上,西人的这一观察恰是19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社会复杂族群关系的显现。汉人对少数民族的主观性打压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汉人需对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管理与控制,因此刻意将少数民族形象符号化与刻板化,以便处在最高位阶上对其进行统治。如台湾学者陈龙廷认为,汉人倾向于将这些与“中国”不同的边疆民族野蛮化,甚至妖魔化。“文明与非文明是帝国中心与边缘论述,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呈现同心圆式族群关系。由天子为中心出发,外层扩散出去,分别为文人官僚、黎民、熟番、生番。这种阶序关系,实际上就是以‘人与非人’的二元论为核心发展而来。”<sup>[19]233</sup>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存在仅仅是汉人自身文化主体的参照物,因此后者常对其进行不公的形象构建,以反衬自身优

越性。更为直观的是,由于汉人观察到的少数民族家庭结构和祖先崇拜行为与其认知不符甚至相反,因此便对少数民族进行指责。而少数民族因受所谓“无妄之灾”,而对汉人多有恶意。

#### 五、余论

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对话,因诸文化辐射影响力的不均而呈现明显的“中心化趋向”,并出现高等级文化对低等级文化多样化的压迫态势<sup>[20]43</sup>。这不仅有违人类文化互动交往的初衷,且往往为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歧视政策提供事实支撑和理论依据。在19世纪中西文化的互动中,这一现象便有所发生。在当时“西强东弱”的大格局下,以赴台西人为纽带的中西文化在台交流平台逐渐建立。西人以自己的方式,将台湾的形象呈现在西方面前。这种符号式的呈现,不仅包括对台湾地区地物风貌的描述,也包括西方人与当时各族群的中国人,以及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相互看法的展现。从宏观上看,西人与中国人的观点与视角始终处于不同的维度。西人在当时“西方优越论”的长期浸润下,虽确有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部分恶习的中肯评价,但在总体上仍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这对当时台湾地区的族群稳定和社会团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彼时“二元”结构所主导的台湾地区社会体系中,汉人与少数民族上演着“自我消耗式”的社会演进过程——汉人与少数民族即共同推进台湾地区的开垦开发,又彼此进行争斗与资源掠夺。这种矛盾与互补,因第三方西人的介入而愈发复杂。从西人对汉人及少数民族的描述来看,虽然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要远低于汉人部落,但由于多方外界因素影响,“善良淳朴”的少数民族较之“丑恶狡诈”的汉人更有优势。

当然,在百余年前那个自然条件恶劣的中国岛屿上,任何的行政机构、政治组织和文化观念均会让群体性行为的执行力不断放大,就如即使在台西人有着“西强东弱”的意识判断,也不得不去适应和理解另一族群的生活观念和表达方式。虽然在西人多元变换视角的阐述下,台湾无奈地成为了“人为建构”的地域及文化符号,但至少说明中西文化多元性的表达需要特定的历史妥协,且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 参考文献:

[1] Albert Londres. Marseille, porte du Sud[M]. Paris: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1980.

[2] 史帝瑞. 福尔摩沙及其住民: 19 世纪美国博物学家的台湾调查笔记 [M]. 林弘宜, 译; 李壬癸, 校注. 台北: 前卫出版社, 2009.

[3] 马偕. 福尔摩沙纪事——马偕台湾回忆录 [M]. 林晚生, 译; 郑仰恩, 校注. 台北: 前卫出版社, 2007.

[4] Janet B McGovern. Among the head-hunters of Formosa [M].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22.

[5] J Thomson.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Vol. 6), 1875.

[6] C Imbault-huart.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M]. Paris: Ernest Leroux, 1893.

[7]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M]. Paris: Nabu press, 2012.

[8] 必麒麟. 历险福尔摩沙: 回忆在满大人、海盜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 [M]. 陈逸君, 译. 台北: 前卫出版社, 2010.

[9] R Swinhoe. A trip to kalgam [J].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2). 1873.

[10] 费德廉, 苏约翰. 李仙得台湾纪行 [M]. 罗效德, 译. 台北: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13.

[11] Jean L. 孤拔元帅的小水手 [M]. 郑顺德, 译. 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 2004.

[12] 白尚德. 十九世纪欧洲人在台湾 [M]. 郑顺德, 译. 台北: 南天书局, 1999.

[13] 蒋毓英. 台湾府志 [M]. 陈碧笙, 校注.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

[14] Mr Paul Dou. Rapport mensuel sur la situation de la colonie [M]. Ho Chi Minh City: Da Capo Press, 1969.

[15] Ferdinand J. Harfeld. Opinion chinoise sur les barbares d'Occident [M]. Paris: Plon-Nourrit, 1909.

[16] Charles W Le Gendre. How to deal with China: a letter to De B. Rand. Keim, esquire,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 Amoy: Rozario, Marcal & Co, 1871.

[17]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M].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2.

[18] Dumont d'Urville. 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M]. Paris: Ernest Leroux, 1834.

[19] 陈龙廷. 帝国观点下的文学想像——清代台湾原住民的妖魔化书写 [J]. 台湾文献, 2004(4).

[20] 陈煦, 郭虹. 次生模式: 边缘——中心文化互动的理论研究 [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5(1).

## The Impression of Taiwan Ethnic Groups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in the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BIAN Liang<sup>1</sup>, LIAN Chenxi<sup>2</sup>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2, China;

2.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marin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deduction process have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culture in Chinese Taiwan. The “other” vision of Westerners can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original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and more fully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one in Taiwan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thnic groups. Firstly, Westerners point out the lag of the Hans’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but affirm the courage and diligence of the Hans. Secondly, while showing the primitive simplicity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e Westerners have ulterior motives to excavate the religious attributes. Thirdly, the Westerners refute their image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ext and try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ones. Fourthly, most of the Westerners do not comment on the mutual evaluation between the Hans and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ut implicitly support the latter. Although the Westerners’ investigation of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transformation can present a more real and dynamic picture of modern Taiwan society, the image interaction of ethnic groups from the multi-perspective can’t easily get rid of the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pattern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ethnic group view of Taiwan; multi-perspec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